

民国时期的中德贸易(1919—1941)

周建明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541001)

内容提要:民国时期中德贸易是典型的先进工业国与落后农业国的贸易。易货贸易、军火贸易是民国时期中德贸易的重要内容。易货贸易采取了“补偿贸易”和“ASKI”马克两种类型的贸易形式。民国时期的中德贸易呈上升趋势。从中国与英美日德贸易指数看,中德贸易表现出发展的后劲。中德贸易收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中国对外贸易收支中的地位在上升。

关键词:民国时期 中德 贸易

1919—1941 年在德贸易发展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 1941 年中德断交,中德贸易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复苏迅速进入其鼎盛时期,达到中德贸易的高潮。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的失败而告终,战争使德国的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对外贸易到 1917 年时已比战前下降 60%,1920 年工业生产已倒退到 1888 年以前的水平。1924 年,在美国垄断资本的扶持下,德国生产开始复苏,短短 5 年时间就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在 1929 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德国经济再次陷入困境,1929—1932 年间,全部工业生产下降了 40%,出口贸易也大受影响,1932 年只及 1929 年的 40%。1933 年希特勒法西斯上台后,工业生产被希特勒绑上战车,为满足扩军备战原料供应的需要,农矿原料进口是这一时期德国对外贸易的重点。德国的外贸政策是,“特别是优先考虑那些为了德国能够购买原材料而准备购进德国工业制成品的国家。”中国正符合德国外贸政策中那种既能为德国提供原料又需要大量德国工业品的国家。德国人认为,中国市场对于德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有优良而价廉的内陆水路运输系统,更重要的是有德国急需且价值无法估量的原料,有人甚至断言:“对于德国未来能否在没有中国市场的条件下生存的问题,必须无条件地做出否定的回答。”

一、民国时期中德贸易的发展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几年时间的中断后,中德贸易在战后逐渐复苏。1921 年《中德协约》在北京签署,两国恢复了外交关系。在协议中,德国政府“取消在华之领事裁判权,抛弃德国政府对于德国驻京使署所属操场上之全部权利于中国,”这一协议中德国放弃了所有的特权、利益和优惠,中德双方重新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建立了联系,德国以一种不同于其它列强的形象出现在中国人面前。德国治外法权的丧失不仅没有影响德国在华的商务活动,相反“在没有德国领事法庭、炮艇和使馆卫队保护的情况下”,德国的商务活动反而赢得了“优越的地位”,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德贸易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一) 中德贸易的主要商品种类

民国时期中德贸易的商品种类,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工矿原料及农副产品,而进口的则主要是工业

阿·巴凯:《纳粹的经济制度》,法兰克福 1988 年版,第 44 页。

(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9 页。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3 册,三联书店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69 页。

(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2 页。

品。按照时为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副局长李耀煌给孔祥熙的报告中所言,“按易货种类由外洋输入者以:A.军械,B.兵工器材,C.交通器材,D.工业机器等为主。其由国内运销外洋者则以钨砂、锑、锡、茶、生丝及桐油等为主。”中国对德国贸易出口的重要物资,据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统计处少将处长孙拯编制的《中德贸易数量统计表》(1929—1934年)的统计有18种,其中价值超过百万国币的有13种,年出口额始终超过百万元的有花生及花生仁、蛋黄白、猪肠、棉花4种,原出口额不足百万元后来超过百万元的有猪鬃、钨矿砂、桐油3种;而原出口超过百万元,后出口额逐步下降,减少至不足百万元的有杏仁、生皮、茶叶、毛皮、芝麻等5种。由此可见,中国对德国出口的商品数量最大,最重要的全是农产品和食品。这样的商品输出结构在整个民国时期基本没有根本的变化。

蛋类产品是中国对德出口的最大宗商品之一,在1929—1934年的有关统计中,蛋品在中国对德出口商品中所占有的比重在13.40%至24.76%之间,除1931年和1933年在对德出口商品中排名第二外,其它年份均位居第一。花生是我国对德出口的传统商品,在对德出口商品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德国是化工大国,油脂工业十分发达,花生是炼油的原料,德国对此需求甚大,1929—1934年间,花生及花生仁的对德出口量始终名列前茅,经常处于第一位,最高的1931年其销德价值所占比例曾高达25.68%,高出蛋类产品10个百分点。

钨矿砂在中德贸易中具有特殊的地位,钨矿砂为国防及工业上不可缺少的金属,钨钢具有韧性强,能抗冲击力,耐高温的特点,被广泛用于军事装备的生产,可用于军舰的甲板、枪炮管以及高速度机械器具等,德国需要的钨98%以上靠从国外进口,中国的钨矿砂含量高达70%,高于欧洲市场所规定的55—65%的标准,因而倍受德国人的青睐,据统计,1929至1938年间德国进口中国钨矿砂的数量成倍增长,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德国从中国进口的钨矿砂增长了4倍多。20世纪30年代的中德易货贸易中,钨矿砂是中德双方最为关注的物资,在德国政府代表克兰致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的函件中,要求中国每年为德国提供8000吨钨矿砂。而中国当时每年钨矿砂的产量平均约6000吨左右,最高的1929年虽曾达9000余吨,而产量低时也只有2000余吨,几乎将中国每年生产的所有钨矿出口德国都不能满足其要求。1935年,当德国方面获悉中国拨给德国2000吨钨砂后,德国政府代表克兰及国防部部长柏龙白先后为此专门致电蒋介石,对蒋介石“准予迅速拨予敝国国防部以二千吨钨砂,至深感慰。”并“谨此感谢莫铭”。1937年,德国进口钨矿砂11372吨,其中的72%便是由中国进口,中国钨矿砂在德国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

早期中德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传统出口商品瓷器、丝织品已退居次要地位,丝织品的出口量已排在约15位之后,而瓷器则在重要出口商品统计中已难觅其踪。

中国从德国进口的重要物资,据统计从1929至1934年有25种,价值始终超过百万元国币的有钢铁制品、机器及零件、军用军械军火、其它化学药品(未列名化学产品附录)、纸张等14种。原价值超过百万,后减少至不足百万的产品有毛纱线绒线、皮革、其他车辆、随身装饰品及女红用品、棉毛丝交织品、火柴及材料6种。原价值不足百万,后逐步超过百万的有电报电话材料、摄影材料2种。

由此可见,我国从德国进口的全是工业制成品,其中以化工颜料、染料、机器五金类商品为大宗。日常生活用品类的只有随身装饰品及女红用品、棉毛丝交织品、火柴及材料、皮革等少数几种,而这几种商品的共同特点是进口额在不断下降,而且下降的幅度很大,如随身装饰品及女红用品至1934年,仅5年时间,进口额只及1929年的1/20,棉毛丝交织品只及1/60,而火柴及材料则已停止进口。反映

马振犊:《中德外交密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3、209页。

(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253页。

熊之孚:“中国钨矿之生产及其对外贸易”,《东方杂志》第33卷第5号。

马振犊:《中德外交密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233页。

Knipping-Mueller: *MachtbeWußtsein in Deutschland am Vorabend des . Welt Krieges*, 慕尼黑1986年版,第197页。

马振犊:《中德外交密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214页。

出这一时期我国对德进口需求中日常生活用品已大为减少,而钢铁、机械、军火、化学制品的进口额则有较大幅度的上升,钢铁类产品进口值甚至已超过亿元。

德国是世界著名的重工业国家,钢铁制品是德国出口中国最重要的商品之一,出口额常年名列前茅,1932—1934 年间其对华出口值曾高居榜首,在德国出口中国商品中所占的比例 1932 年一度高达 15.34%,比当年位居第二的机器及零件制品的进口额高出 1 倍还多。

德国以生产化工颜料、染料著称于世,染料在德国对华贸易中长期占有重要的地位。“德国出产物品,如五金颜料等项,向为华人所乐购。”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进口的染料在中国市场上一直居第一位,1910—1913 年间,销往中国的德国染料从占德国出口总额的 10% 上升到 40%。大战期间,中德贸易中断,法国曾一度取代德国的地位,但战后,德国又重新恢复了它的地位,对华输出的染料、颜料位居各国之首,由于德国染料在中国市场上享有盛誉,以至一些日本商人仿冒德国品牌在中国市场上销售,以谋取暴利。至 1934 年中国进口颜料总额的 49% 和进口化学产品总额的 31% 均为德国产品。

机械也是德国对华出口的重要商品,在中国进口的机械中,以英、美、德、日几国的机械为主,英、美机械质量虽好,但价格昂贵,德国机械质优价廉,因而受到欢迎。德国进口的机械以化工机械、电气机械和纺织机械为主。

纸类是德国出口中国的大类商品之一,曾占我国纸类进口总额的 10% 以上,在德国输华商品中所占的比重通常在 5—8% 之间,且比较稳定,波动较少。德国对华出口的纸类品种较多,有普通印书纸、油光纸、包皮纸洋古纸、未列名印书纸、未列名纸纸货、写字纸画图纸等。其中包皮纸洋古纸、未列名纸纸货一度在各国输华纸类中名列第一。

中德贸易从商品的种类及价值来看,进出口商品是典型的先进工业国与落后农业国的贸易。“就中德贸易商品观察,有一点颇值吾人注意,即输入商品多属生产建设之工具,输出则以工业原料为大宗,”德国出口中国的产品品种类多,价值高,以工业制成品及半制成品为主;而中国出口德国的产品,种类较单一,价值低,以农产品、矿产品原料为主。而且中国出口超过百万元的大宗产品中,花生及花生仁、蛋黄白、棉花都呈下降趋势,而德国出口中国超过百万元的大宗产品中,钢铁、机器、化学制品等则呈上升趋势,反映出中德间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

(二) 易货贸易——中德贸易的重要形式

易货贸易是民国时期中德贸易的一种特殊形式。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德国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巨额的战争赔款让德国政府陷入困境,据当时德国方面的消息,由于现款短缺,“一切贸易渐有趋入以货易货之势,农民之纳税,非但多以农产充数,且日常所需之物品,亦多以有易无,故各地官厅存货堆积,静候政府决定,将来对于失业工人之津贴,是否亦可用货物充数,再则钢铁托辣斯,近以在鲁尔区内各煤矿积存之煤,已达九百万吨之多,故拟向荷兰当局接洽,愿以此项存煤,向荷兰交换菜蔬食粮云。”国内经济尚且如此,对外贸易货币短缺的问题则更为严重,到 1933 年德国的外汇储备已是捉襟见肘,发展经济、扩军备战和外汇匮乏的矛盾日益尖锐,为解决这一矛盾,德国“趋向于由物品交换途径以抵补其国外生产品之需要,藉以改善金融现状,而扩充其经济建设。”并“热切希望与那些可为

王光祈:“德国对华之商业”,《申报》,上海书店 1983 年影印本,第 167—622 页。

(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9 页。

《申报》,上海书店 1983 年影印本,第 168—739 页。

Karl Drechsler: *Deutschland, China, Japan, 1933—1939* (《德国-中国-日本, 1933—1939 年》), 柏林 1964 年版, 第 29 页。

“民国二十四年第三季第四季贸易报告”下篇,《国际贸易导报》第 8 卷第 5 号,第 41 页。

“各国贸易消息”,《国际贸易导报》第 2 卷第 10 号(1931 年),第 27 页。

“各国贸易消息”,《国际贸易导报》第 2 卷第 10 号(1931 年),第 27 页。

它提供原料及需要工业产品的国家发展易货贸易关系。”为此德国政府采取了易货贸易、延期偿还外债、修改进出口制度等种种措施,与中国、墨西哥、巴西、土耳其等国进行易货贸易,以换取德国急需的战略原料。而中国正急需大批的军火和各类物资,而苦于缺乏外汇,因此与德国一拍即合,德国奥托·俄普夫公司总裁 Otto Wolff 在《发展中德贸易意见书》中提出,“中国欲实行其建设计划,必须大量输入机器及其他生产工具。但因资本缺乏,原料及半熟货输出之减退,以及银币贸易受世界市场之影响,建设计划之实行殊多障碍,而德国则适居其反,正亟图增加其工业制造品之输出,保持其购买外国原料及半制品之能力,苟两国通力合作,互济供需,实为两利。”鉴于“德国工业发达,技术进步,对于中国建设所需之机器及其他生产工具均有供给之能力,……中国可以供给多种德国所需之物,如桐油饼、饲料,若干种矿物如锡、钨等。”当时负责这一事务的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统计处少将处长孙拯也认为,“Otto Wolff 所提议组织资金团行交换贸易之办法,实适合我国之需要。”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德双方的易货贸易符合双方的利益,对此,双方政府都极为重视,在蒋介石亲自过问下,几经磋商,中德双方于 1934 年 8 月 30 日签订《中国农产品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合同强调,“本合同之目的,在于藉中国农矿原料,与德国工业品,及其他各种成品之交换,以促进两国工商业与政治之建设,并以增进两国人民之强盛。”对于易货贸易实施的具体办法,合同规定,“中国政府供给德国之农矿原料,亦随时价计帐,以作在德存款,中国政府得随时按照合同原意自由支配该项存款,移供购进德国工业品及其他成品之用。”此后,对易货贸易实行中的有关问题,中德双方又签订了多项协议,如 1935 年签订的《中德易货运输及价目协订办法协议》,1936 年签署的《中德信用借款合同》等。鉴于易货贸易对中国的重要作用,蒋介石曾专门致电德国总理希特勒、德国国防部长柏龙白、经济部长沙赫特等人,表示“中德经济合作承先生热心赞助,商洽告成,合同现已签字,至为欣谢。余对此事甚为满意。”希特勒也曾就此事致电蒋介石说,“中德两国之货物互换,实给予两国经济进展以莫大裨益,获蒙钧座异数关垂,谨为申谢。”在中德贸易中,德国对于通过易货贸易能获得的中国工矿原料寄予厚望,德国政府代表克兰表示,“敝国农矿原料之需要,异常广泛,足以包括中国输出可能之全部。”德方希望在中德易货贸易实施的第一年内,中方能向德方提供德国所急需的物资,德方开列了急需物资的清单,大豆 10 万吨,花生 10 万吨,油子(以芝麻为最)5 万吨,棉花 1 万吨,锡 4 000 吨,锑 4 000 吨,钨砂 4 000 吨,镍 30 万马克,桐油 2 500 吨。而德方向中方提供的工业品为变款及投资 2 000 万元,钢铁厂 2 500 万元,其余重工业各厂机械 3 000 万元,军械 6 000 万元,兵工厂机械 3 000 万元。实行易货贸易后,德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1934 年,德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 6.1%,1935 年占 8.7%,1936 年上升到 11.4%,1937 年更是上升到 11.5%,虽然缺乏确切的数字表明易货贸易在中德贸易中所占份额,但中国的作战物资基本上是通过易货贸易从德国进口的,其它像金属、机器、交通器材等也大部分是通过易货渠道购进。

(三)“补偿贸易”和“ASKI”马克

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上台后,推行“新经济计划”,支持发展对外贸易。由于易货贸易的特殊性,在 1934—1936 年间,易货贸易采取了“补偿贸易”和“ASKI”马克两种类型的贸易形式,所谓补偿贸易是允许进口商将其商品低价销售给出口商,出口商则用外汇向进口商付账,交易允许出口商以大大低于市面价值在中国低价销售货物。ASKI 是德语“Ausländersonderkonto für Inlandszahlung”的缩写,意为国内付款的外国特别帐户。在“ASKI”马克贸易中,德国进口商收到同其实际货物相比已大大涨价的货款并将之存入授权银行的“ASKI”账户上,然后他将其 ASKI 马克减价卖给德国出口商。这样,出口

马振犊:《中德外交密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8、24—25 页。

马振犊:《中德外交密档》,第 199—200、202 页。

马振犊:《中德外交密档》,第 324—325、336、4 页。

马振犊:《中德外交密档》,第 228、231—232、204 页。

何炳贤著:《中国的国际贸易》,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版,第 252—253 页。

商就可以降低其产品价格,而同时进口商在出口交易的进程中得到补偿。这种结算方式的具体做法是,中国商品的出口商认可他们的产品在德国的售价,允诺支付他们出口货单总价值的 10% 到 20% 用来进口德国货物,否则其在中国市场上的价格就会因马克报价及其他因素而显得太高。举例为证:一个中国商品出口商航运价值 400 000 Aski 马克的棉花到德国,那他将从中国银行得到仅为 400 000 Aski 马克等值减去 10% 价值的白银,大约值 360 000 美国先令,差额保存在中行特定的帐户里,转交给德国货的进口商。德国货物进口商要求中行开具一份 A/P,以支付限在返回 10% 的总帐目数额以内的需要。例如,他想要从德国进口价值 100 000 Aski 马克的商货,他只需要支付 90 000 Aski 马克,而另外又能从中行特定帐户的积累结算总数 100 000 Aski 马克中额外获得 10 000 马克,通过这种方法出口商可以出口比以前更多的货物,更重要的是,两国不必交换现银、黄金或外币。上海的德商会指出,这两种贸易形式对德国对华输出的增长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 军火贸易

战后重新进入中国市场,军火贸易是易货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处于军阀混战时期,各地军阀为扩充实力,纷纷招兵买马,中国军队的数量从 1916 年的 50 万猛增至 1928 年的 200 多万,而当时中国每年能生产的枪械总数则不超过 20 万,由于 1919 年英、法、美、日等国签订了武器禁运协议,为制止中国内战,签约国允诺停止对中国的一切武器供应,德国则非协议成员国,它不受此条约协议的限制,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刺激了德国的军火输出,据中国海关的统计,仅 1925 年,德国船运进的武器总值就达 1 300 万马克,超过全部外国武器进口值的一半以上,而这还不包括走私和通过第三国转口的数字在内。中国军队装备的不是少量的零碎部件,而是整批的德国军备,德国《民族观察》(Völkische Beobachter) 驻远东记者描述道:“整师整师的(中国军队),从步枪、坦克、到钢盔,都是由我们德国国防军使用过的德式军品装备起来的,”到抗战前,南京城配备了德制 88 毫米高射炮和德制的防空警报系统;75 毫米克虏伯大炮,亨舍尔及 M. A. N 型坦克;空军装备了德制的战斗机,海军订购了 12 艘德国的潜水艇和几艘战舰。据统计,至抗战前夕,中国已成为德国军火出口的主要客户,1935 年德国向中国出口武器和弹药 84.1 万马克,占全部出口百分比的 8.1%,仅次于英国,排名第二。时隔一年,1936 年德国向中国出口武器弹药额就骤升至 645.5 万马克,占德国全部武器弹药出口量的 28%,排名第一,而且据估计,实际数额大约要 10 倍于此。中德军火贸易一方面主要是通过易货贸易的形式进行,另一方面军火往往是由政府官员或政府出面购买,一次性购买的数量大。如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陈仪 1928 年在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鲍尔陪同下考察德国,陈仪向克虏伯、西门子公司订购了价值 100 万马克的军火。1932 年,南京政府又一次向德国购买了能装备一个两团制炮兵旅的卜福斯(Bofors)山炮。1933 年,时为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宋子文访问德国,一次就与德方签订了包括 1 000 挺机枪在内,价值达 5 000 万马克的军火购买合约。1934 年中国向德国购买的武器,仅轻机关枪便有 5 000 支,廿十响驳壳手枪 5 000 支,配弹 500 万发,七九步枪 1 万支并子弹 1 亿发。还不包括高射炮、坦克等重型武器。1935 年中国向德国订购的军火价值更是高达 1 亿马克以上。大批量的军火贸易,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德贸易的发展,并非是市场经济的结果,这一时期政治与军事的因素显然在贸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五) 德国对华贸易的重要机构——合步楼

合步楼(Hapro)是德国对华贸易的重要机构,在民国时期的对华贸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合步楼公司是工业产品贸易股份有限公司(Handelsgesellschaft für Industrielle Produkte)的简称,1934 年在

(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30—231 页。

马振犊:《中德外交密档》,第 333—334 页。

(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3—34 页。

(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61—263 页。

马振犊:“抗战爆发前德国军火输华述评”,《民国档案》1996 年 3 期。

德国国防部、经济部及国家银行的支持下,由汉斯·克兰创办,公司在法律的意义只是一家私人公司,但在德国军政部的控制下主要销售军火及军工设备。尽管合步楼有着特殊的背景,在中德贸易中扮演着十分独特的角色,然而在其实际经营中却并非以政府公司的名义出现,而是时而以民营公司的角色出现,时而又凭借其背景操纵甚至支配规模大得多的著名公司。1934年,合步楼公司大量采购德国的军备运往广州陈济棠政府。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访德期间,与德方达成了若干协议,其中明确规定,“代表德方实施一切货运供给之机关,仍为国营合步楼公司。”合步楼之所以采取这种亦官亦民的特殊身份,是因为这种方式为进行贸易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合步楼在南京办事处的负责人瓦尔特·埃克特曾指出:“由一家私营公司而不是外交部或经济部等官方机构来签订(一份中德易货贸易协定),是明智之举,它有利于对世界上其它国家保守(协定)的秘密。”合步楼在中国的贸易是卓有成效的,在合步楼的积极推动下,中德贸易尤其是军火贸易迅速发展。克兰曾承诺向中国提供一笔高达1亿德国马克的贷款,这对于当时不能从国际金融市场获得贷款的中国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借助这笔贷款,中国政府订购急需的德国工业产品,而中国提供的原材料则为德国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原料市场。1937年时,德国已取代英国成为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成为进口德国武器最多的国家。据合步楼公司统计,从1934年8月实施中德易货贸易以来,至1938年8月的4年时间内,德方输华军火价值达3.89亿马克。20世纪30年代后期,中德贸易达到鼎盛时期,最高的1937年,中德贸易进出口总额达9100余万两海关金。

1938年后中德关系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两国的贸易还在维持,但贸易额已急剧下降,1940年降至21844千海关金,仅为1937年的1/4左右。1941年7月2日国民党政府宣布与德断交,中德贸易也就此中断。

二、民国时期中德贸易的经济分析

(一) 中德贸易的基本趋势

由下表可对中德贸易情况作一基本分析。

1. 民国时期的中德贸易呈上升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德贸易的发展较为迅速,战前1913年中德贸易额为4500余万海关两,大战期间中德贸易几尽停顿,而战后仅5年时间,到1923年,中德贸易已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此后持续增长,至1930年贸易总额比战前已翻了一番。

2. 中德贸易中中国长期入超。除大战结束后的1919年,中德贸易还未走上正轨外,其余年份中国对德贸易均为入超,且入超额呈增长趋势,1920年时为360余万海关两,1931年达6000万海关两,进口额是出口额的3.6倍。入超额最高的1936年更高达到11000余万美元。中国之所以长期入超,与中德间贸易的商品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出口产品以农产品及矿产为主,此类商品技术含量低,单位价格低廉,而从德国进口的主要为工业制成品及机械设备,技术含量高,单位价格高,而中国对德国的工业品需求较大,机械类产品大多自己不能生产,依赖进口,致使入超额不断增加。

3. 中德贸易中进口额增加比出口额的增加更快。进口和出口虽都呈增长的趋势,但出口增长较为缓慢。按海关两分析,如1923至1926年间,中国对德出口额均在1100万海关两至1700万海关两之间,未能突破2000万海关两,增加额为500余万海关两。同期对德进口额由3100余万海关两增至4500余万海关两,突破了4000海关两,增加额为1300余万两。1927至1932年间,出口额在2000至2900万海关两之间,未达到3000万两,增幅为44%。同期从德国进口额由3900余万海关两,增至

吴景平:《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页。

(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页。

马振犊、戚如高:《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第317页。

马振犊:《中德外交密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6页。

7 100 余万海关两,增幅达 82 % 左右。进口额增长的速度远远高于出口,反映出这一时期的贸易逆差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表 1 中德贸易统计表(1911—1941 年) 单位:千海关两(1911—1932 年);千美元(1933—1941 年)

年份	中国从德国输入	中国对德国输出	中国对德贸易平衡出超(+)、入超(-)	合计	年份	中国从德国输入	中国对德国输出	中国对德贸易平衡出超(+)、入超(-)	合计
1911	22 457	14 096	- 8 361	36 552	1927	39 354	20 355	- 18 999	59 709
1912	21 130	14 339	- 6 791	35 469	1928	55 697	22 825	- 32 872	78 522
1913	28 302	17 025	- 11 277	45 328	1929	67 076	22 458	- 44 618	89 534
1914	16 697	12 063	- 4 634	28 760	1930	69 105	23 361	- 45 743	92 467
1915	160	—	- 160	161	1931	83 514	23 138	- 60 376	106 652
1916	24	—	- 24	25	1932	71 914	29 833	- 42 081	101 747
1917	—	—	—	—	1933	108 016	20 795	- 87 221	128 811
1918	—	—	—	—	1934	93 398	19 159	- 74 239	112 548
1919	—	164	+ 164	164	1935	103 385	28 926	- 74 459	132 311
1920	5 418	1 761	- 3 657	7 179	1936	150 238	39 174	- 111 064	189 412
1921	13 349	6 774	- 6 575	20 123	1937	146 374	72 477	- 73 897	218 850
1922	24 744	9 805	- 14 939	34 549	1938	112 939	56 440	- 56 499	169 379
1923	32 456	11 915	- 20 541	44 371	1939	87 167	45 097	- 42 070	132 264
1924	38 688	15 949	- 22 738	54 637	1940	55 033	4 099	- 50 934	59 131
1925	32 511	16 427	- 16 083	48 938	1941	48 186	20 730	- 27 456	68 916
1926	45 678	17 760	- 27 917	63 438					

资料来源:据 Hsiao Liang-Lin: *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1864—1949*, Published by Esa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Distributer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74, 第 145—146 页计算整理。

按美元分析,1933 年至 1941 年,中德贸易逆差总的趋势是在缩小。除 1936 年贸易逆差较大外,其余年份贸易逆差呈缩小的趋势。1933 年贸易逆差为 8 722 万美元,至 1941 年已减至 2 745 万美元。

(二) 中德贸易与中国对英日美贸易的比较分析

由下表可见:

表 2 中德贸易与英日美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比较表(1911—1931 年) 单位: %

年份	德国	英国	美国	日本	年份	德国	英国	美国	日本
1911	4. 25	12. 48	8. 70	16. 46	1922	2. 12	11. 28	16. 36	24. 00
1912	4. 14	10. 60	8. 32	17. 08	1923	2. 61	9. 62	16. 53	24. 07
1913	4. 58	11. 44	7. 39	19. 68	1924	3. 02	9. 73	16. 11	24. 07
1914	3. 06	13. 59	8. 66	20. 39	1925	2. 81	8. 09	16. 41	27. 91
1915	0. 02	11. 55	10. 90	22. 09	1926	3. 16	8. 57	16. 81	27. 31
1916	—	10. 35	12. 38	26. 88	1927	3. 06	6. 81	14. 78	25. 74
1917	—	7. 51	14. 97	31. 47	1928	3. 57	7. 94	15. 12	24. 89
1918	—	7. 07	12. 77	37. 82	1929	3. 90	8. 42	16. 05	25. 23
1919	0. 01	9. 27	16. 13	33. 73	1930	4. 16	7. 69	16. 39	24. 45
1920	0. 53	13. 23	15. 68	27. 66	1931	4. 52	7. 83	18. 73	23. 78
1921	1. 31	11. 79	17. 30	24. 93					

资料来源:徐雪筠:《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1882—1931 海关十年报告》,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55—356 页。

1. 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中德贸易所占的比重不大。在中国对外贸易的几个主要国家中,德国所占的市场份额要远远低于其它国家。即便是在中德贸易最为发达的 20 世纪 30 年代,中德贸易所占的比重与其它主要国家相比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2. 德、英、美、日对华贸易的发展状况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为前一时期,第一次大战后为后一时期。在前一时期,除个别年份外(1913 年),中德贸易已呈现下降趋势,至大战期间,中德贸易已完全停止。这一时期中英贸易的趋势与中德贸易相似,呈下降趋势。而与此相反,美、日对华贸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与大战期间呈迅速上升趋势,日本尤为明显,大战期间达到极盛。大战期间,欧洲陷于战乱,对华贸易受阻,中国对外贸易的重点因而转向其它国家,美、日等国趁虚而入,抢占中国市场,在华的市场份额迅速扩大。后一时期,中德贸易呈稳步上升趋势,所占百分比从 1921



年的 1.31 %增长到 1931 年的 4.52 % ,10 年增长了 3.4 倍。中美贸易虽也呈上升趋势,但表现为不稳定状态,时而上升,时而下降。同期所占百分比从 17.3 %增长到 18.73 % ,仅增长 1 个百分点。

中英、中日贸易均呈下降趋势。中英贸易短暂上升后便日益滑坡,1921 至 1931 年所占百分比从 11.79 %下降到 7.83 %。中日贸易在经历了大战期间的鼎盛时期后,便一蹶不振,一直走下坡路。

由上可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中国对德美英日几个主要国家的贸易中,只有中德和中美贸易所占百分比在不断上升,虽然德国所占的比重不大,但德国上升的速度最快,显现出中德贸易的地位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不断上升。

表 3 中德贸易指数与美日英比较表(1913—1932 年) 单位:1913 = 100

年份	中国进口贸易				中国出口贸易				中国对外贸易总额			
	德国	美国	日本	英国	德国	美国	日本	英国	德国	美国	日本	英国
1913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914	59.0	116.4	106.6	108.6	70.9	106.7	98.55	138.1	63.5	111.6	107.0	114.7
1915	0.6	104.6	100.8	73.9	—	160.9	118.5	195.3	0.4	133.6	147.8	91.2
1916	0.1	151.9	134.5	72.6	—	191.5	173.2	201.3	—	172.2	177.0	92.9
1917	—	172.1	185.8	53.7	—	251.8	161.4	161.7	—	213.1	216.4	68.9
1918	—	165.6	200.2	51.5	—	204.9	249.3	154.5	—	185.8	238.8	66.4
1919	—	321.1	207.0	66.4	1.0	268.6	297.5	350.0	0.4	289.1	200.6	109.0
1920	19.1	404.2	192.1	135.9	10.4	178.3	216.6	280.2	15.8	187.7	206.7	156.7
1921	47.2	496.3	176.3	154.7	39.8	237.8	262.6	189.1	44.4	363.0	211.5	159.6
1922	87.4	460.1	194.0	149.9	57.6	259.2	243.8	235.5	76.2	364.7	211.5	162.0
1923	114.7	435.9	176.9	124.2	70.0	336.8	303.0	264.3	97.9	384.9	221.4	144.4
1924	136.7	536.4	199.3	130.1	93.7	267.6	307.0	307.3	120.5	399.1	235.6	155.6
1925	114.9	402.2	251.3	96.1	96.5	380.2	281.0	291.4	108.0	390.8	262.8	129.3
1926	161.4	529.6	282.4	120.0	104.3	318.9	323.0	341.5	140.0	462.1	296.6	151.9
1927	139.1	470.8	246.3	77.5	119.6	302.1	318.6	354.7	131.8	394.9	271.7	117.4
1928	196.8	580.1	266.8	117.4	134.1	337.9	348.8	373.5	173.2	455.2	296.1	154.3
1929	237.0	651.6	270.9	122.8	131.9	364.2	391.3	454.6	197.5	504.4	313.3	170.8
1930	244.2	656.0	274.2	111.5	137.2	350.3	330.4	383.3	204.0	498.4	293.9	150.9
1931	295.1	909.8	274.9	123.7	135.9	319.3	404.3	394.5	235.2	604.0	303.1	162.9
1932	254.1	759.7	126.6	122.9	175.2	159.3	174.8	230.0	224.5	450.3	143.6	137.4

资料来源: 杜廷珣:《美国对华商业》,第 42 页,转引自李一文《近代中美贸易关系的经济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3 页; 据何炳贤《中国的国际贸易》,商务印书馆民国 26 年版,第 249—251 页整理计算。

由上表可见:

1. 中德贸易进口贸易指数呈稳定上升趋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只有 1925、1927、1932 三个年份比上年有所减少,其余的年份均在上升。在德、美、英、日 4 国中,中德贸易进口指数低于美国和日本,1924 年以前低于英国,1924 年以后则高于英国。4 国中只有中德进口贸易在大战期间完全停止,但中德贸易进口战后发展很快。1923 年就已恢复到战前水平,1924 年进口贸易指数便已超过英国。中美、中日贸易进口贸易指数大战期间均在继续增长,美国比战前增长了 3 倍,日本增长了 2 倍,中英贸易进口在大战期间虽未停止,但比战前有所减少。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德贸易进口的指数不仅超过英国,也超过了日本,仅次于美国。

2. 中德贸易中出口贸易指数虽也呈上升趋势,但数额最低。大战期间,中德出口贸易也一度中断,到 1926 年才恢复到战前数额,反映出中国对德贸易出口增长较慢,出口乏力。而中美、中英、中日出口贸易指数大战期间不仅未停止,而且增长 2 至 3 倍。就出口而言,中德贸易指数在德、美、英、日 4 国中,数额最低,增长最慢。

3. 在对外贸易总额中,中德贸易指数低于美国,大部分时间也低于日本,但在 20 世纪 30 年代已有超过日本的记录,1927 年后超过英国。显示出中德贸易随时间推移,表现出发展的后劲。

(三) 中德贸易收支与中国对外贸易收支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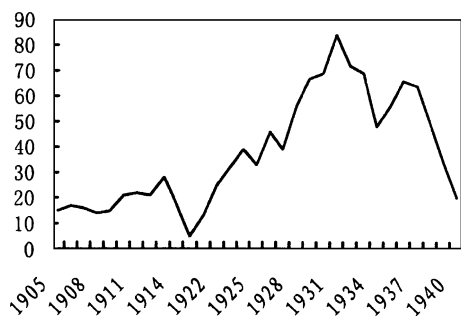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对德贸易支出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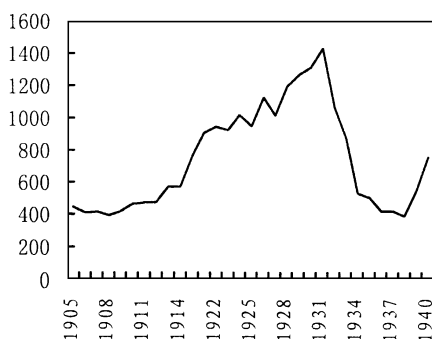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对外贸易支出示意图

上图1、2所示,中国对德贸易支出有三个高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是第一个高峰,此后便一直下降,大战期间跌至谷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德贸易支出一直走高,1931年达到第二个高峰,此后又一路走低,1936年是第三个高点,对德支出再次上扬。

中国对外贸易支出在20世纪30年代前,基本上呈上升趋势,到1931年达到高点,此后便一直走下坡路,到30年代末出现回升,支出再次走高。中国对外贸易支出的轨迹与中德贸易支出相比不尽相同,中德贸易支出有两个较大的峰谷,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二是1934年,而中国对外贸易支出只是在30年代后期出现一个较大的峰谷,其它大部分时间均呈上升趋势。相同的是两者的高点都有出现在1931年。总体看来,中德贸易的支出波动性较大,而中国对外贸易支出的波动性则较小,除了双方的峰值出现时间一致外,其余时间则有所不同,如1936年对德支出增加时,中国对外贸易的支出却在减少,而1940年中国对外贸易支出增加时,对德贸易的支出却在下降,可见中德贸易支出与中国对外贸易支出的情况并不完全同步。

由表4可见:

1. 贸易逆差始终存在,中德贸易中一直存在收支不平衡状况。中德贸易支出始终多于收入,与中国对外贸易收入的情况一致。但中德贸易收支差额的比例大于中国对外贸易收支差额的比例。除了民国初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中德贸易中支出大于收入大多在1倍以上,以2至3倍居多,最多时差额达到10倍。而中国对外贸易支出与收入虽有逆差,但绝大多数年份差额均不及1倍。民国初年,中德贸易的支出占中国对外贸易支出的4%左右,而到20世纪30年代已超过10%,最高时达到15%以上,而收入所占比例从民国初年的3%左右一直到30年代末均未超过10%,最高时仅为8%,约为支出所占的一半。

2. 中德贸易逆差呈扩大趋势。中德贸易中支出所占比例一直呈上扬趋势,而收入所占比例虽总体有所上升,但其间较为波动,所占比例时升时降,表现不稳定。两者差距不断扩大。支出所占比例恢复较收入所占比例为快。1923年战后仅短短数年,支出所占比例已超过1914年战前水平。而收入所占比例直到1932年才超过战前水平,晚了近10年,反映对德出口乏力,增长缓慢。中国对德贸易收入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基本上在2—3%之间,没有太大的变化,而30年代以后,比例呈上升态势,最高时曾达到8%。而支出所占比例30年代以前大多在3—4%之间,30年代后半期有迅速的增长,所占比例曾高达15%以上,与收入之间的差额扩大。1911年至1940年,中德贸易支出共107 400万关两,年均3 700万关两。1911年至1940年,中德贸易收入共41 300万关两,年均1 400万关两。中德贸易收入年均逆差2 300万关两。民国期间近30年中德贸易中逆差共66 100万关两。中国对德贸易年平均收入占中国对外贸易收入3.1%,中国对德贸易年平均支出占中国对外贸易年平均支出5.56%。

表 4 中国对德贸易收支与中国对外贸易收支关系表(1905—1936 年) 单位:百万关两

年份	中国对德贸易收支			中国外贸收支			A/D (%)	B/E (%)	C/F (%)
	收(A)	支(B)	总额(C)	收(D)	支(E)	总额(F)			
1905	5	15	20	228	447	680	2.19	3.36	2.94
1906	6	17	23	236	410	647	2.54	4.15	3.55
1907	6	16	22	264	416	681	2.27	3.85	3.23
1908	7	14	21	277	394	671	2.53	3.55	3.13
1909	8	15	23	339	418	757	2.36	3.59	3.04
1910	13	21	34	381	463	844	3.41	4.54	4.03
1911	14	22	36	377	472	849	3.71	4.66	4.24
1912	14	21	35	371	473	844	3.77	4.44	4.15
1913	17	28	45	403	570	973	4.22	4.91	4.62
1914	12	17	29	356	569	925	3.37	2.99	3.14
1920	2	5	7	542	762	873	0.37	0.66	0.80
1921	7	13	20	601	906	998	1.16	1.43	2.00
1922	10	25	35	655	945	1 012	1.52	2.65	3.46
1923	12	32	44	753	923	1 041	1.59	3.46	4.23
1924	16	39	55	772	1 018	1 278	2.07	3.83	4.30
1925	17	33	50	776	948	1 304	2.19	3.48	3.83
1926	18	46	64	864	1 124	1 507	2.08	4.09	4.25
1927	20	39	60	919	1 013	1 932	2.22	3.89	3.09
1928	23	56	79	991	1 196	2 287	2.30	4.66	3.43
1929	22	67	90	1066	1 266	2 281	2.11	5.30	3.92
1930	23	69	92	895	1 310	2 005	2.61	5.28	4.61
1931	23	84	107	887	1 428	2 315	2.61	5.85	4.61
1932	30	72	102	493	1 063	1 556	6.05	6.77	6.54
1933	13	69	83	393	872	127	3.40	7.95	6.53
1934	10	48	57	272	529	801	3.57	8.99	7.15
1935	16	56	71	307	504	811	5.08	11.2	8.76
1936	17	66	84	313	418	720	5.55	15.91	11.64
1937	32	64	91	369	421	790	8.64	15.31	11.56
1938	24	49	74	332	389	720	7.39	12.70	10.26
1939	19	34	52	409	543	1 052	4.55	6.18	4.96
1940	2	20	22	730	755	1 486	0.21	2.69	1.47

资料来源：1905—1926 中国外贸收支据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 1840—1948》，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37 页。

1905—1926 中德贸易收支数据据《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00 页。

1927 年以后数据据《中德外交密档》，第 226 页。

勘误：《中德外交密档》第 226 页表格中数字有误，1933 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为 162 257，应为 1 265 257；1930 年对德贸易总额为 192 466，应为 92 466；1939 年对德贸易输入为 3 553，应为 33 533，总额为 54 175，应为 52 153；1940 年对德贸易输入额 70 773，应为 20 330。

百分比全部重新计算，小数点后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采取四舍五入的原则处理。原统计表输入百分比中除 1905、1913、1926、1933、1936、1938 年份外，其余均有误。输出百分比除 1913、1922、1923 至 1927、1930、1936 至 1939 年外，其余均有误。合计百分比中除 1932、1933 年外，其余也有误。

3. 中德贸易收支在中国对外贸易收支中的影响不断扩大。中德贸易总的形势是支出在不断增加，而收入在不断地减少。以收入而论，中德贸易中，中国处于不利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德贸易总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年均 3.6%，战后年均占 5.3%。中德贸易收支总额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在 20 世纪 30 年代前时升时降呈波动状态，不太稳定。而 30 年代后呈稳定的上升趋势，持续走高，30 年代后期达到高潮，中德贸易收支在中国对外贸易收支中的地位在上升。